

《國家與學術：清末民初關於「國學」的思想論爭》，羅志田著，北京：三聯書店，二〇〇三年。27+四二四頁。

楊芳燕，臺灣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

什麼是國學？國學是否有礙中國「走向世界」？國學自身怎樣走向世界？這些困擾上世紀初兩代中國學人的問題，在羅志田教授的新作《國家與學術：清末民初關於「國學」的思想論爭》一書裏，輾轉成為一名後代史家挖掘國學生命史跡的關鍵線索。本書是羅教授題為「從國學到史學：清季民初中國學術的傳承與更新」的研究計畫中，內外篇之外篇部分的成果展現。該計畫旨在探討「近代中國史學在西方學術的衝擊下怎樣確立自身的學科定位」，內篇「沿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論證研究取向、方法、史料觀等具體的重要問題」，外篇（亦即本書）則側重探討「學術的思想和社會語境與學術發展的關係」（〈自序〉，頁13）。本書據以立論的一個基本觀察是：清末民初有關國學的諸多議論，實「遠遠超出了『學術』的範圍，而形成了社會參與相對廣泛的思想論爭」（〈自序〉，頁1）。

在題材與歷史斷限上，本書大體涵蓋清末保存國粹與民國整理國故兩大運動。過去學界對這兩個運動已多所討論，本書另闢蹊徑，以「國學」為焦點，透過對庚子事變後至一九二〇年代末一系列相關論爭的解析，描繪出歷經兩大運動的國學浮沉史，隱約中亦為近代史學之興起勾勒出一個歷史與思想的脈絡。作者選擇結合思想史與學術史的取徑，兼及社會史的觀察，於細究各方有關國學的諸多不同見解之際，對其間浮現之重大歷史議題——如中國的邊緣化與存亡危機、中西文化之交涉與衝突、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之興起與認同問題、科學主義之崛起與傳統文化之價值失勢、學術與政治之分合等——亦有所觀照。在晚近學界有關國學與史學的專著中，本書無疑最具思想史意趣，然就分析視野之廣及主題、議題層次之多樣而言，本書毋寧皆有參照濟偏之功¹。另一方面，本書雖囊括許多思想

¹ 晚近的相關專著包括：陳以愛：《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——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（1922-1927）》（臺北：政治大學歷史系，1999年），修訂版（南昌：江西出版社，2002年）；桑兵：《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）；Q. Edward Wang（王晴佳），*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: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*（Albany, NY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, 2001）；劉龍心：《學術與制度：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》（臺北：遠流出版事業公司，2002年）。桑兵、陳以愛與劉龍心的書基本上是學術史的取徑，後二者尤側重探討學術分科的建制與教育實踐。王晴佳的書雖亦處理思想，但焦點集中在二、三十年代胡適、傅斯年、顧頊

史及學術史的重大議題，然作者點到為止的論述風格往往使細緻深入的討論未及開展。這個基本的印象，使筆者覺得在閱讀本書過程中雖所獲匪淺，但畢竟更多的是意猶未盡之憾。作者雖開宗明義即指出本書以敘述為主（〈自序〉，頁17），然為不辜負本書在議題上已作的提示，並為尊重議題自身的完整性（integrity），底下在介紹本書要義之後，謹就其中一、二試作進一步辨析，藉以拋磚引玉。

除了具導論性質的長篇〈自序〉外，本書共分八章，清末、民國各占四章，各章則皆緊扣特定的論爭，包括：中學有用與無用之爭、物質與精神文明之爭、國粹與歐化之爭、語言文字之爭、國學和國故與科學之爭、整理國故的目的之爭，以及學術分類與學科定位之爭等。根據作者所言，本書對於這些論爭的呈現方式有兩方面特點。第一，特別注重這些論爭的「延續性」，並強調「回向原典」的文本分析以及將文本置入「當時思想言說」的脈絡化分析，立意透過代表不同見解之文本的精讀，逼近彼時衆聲喧囂、「觀念競爭」的言說「原狀」（〈自序〉，頁15）。第二，偏重敘述，並對原始文獻（尤其是不同見解）盡可能的徵引（〈自序〉，頁17）。

在廣納百川的視野下，本書泰半篇幅乃著力於鋪陳各個論爭的曲折原委，但行文中亦隨處隱藏攸關大勢之所趨的宏觀線索。化繁為簡地說，本書所述庚子後三十年間的國學生命史，是國學「在尊西趨新和民族主義這兩大二十世紀主流趨勢的互動下」（頁401），從「國粹」的地位遞演為「國故」地位的歷程。亦即是：在兩代學人追求變革以使中國及其學術「走向世界」的驅策下，國學一步步祛除「粹」的價值光環，先是以歷史文物或材料（所謂「故」）的身份被科學所接收，成為「科學方法與精神」的用武之地（見五、六、七章），終而在現代學術分科法則的操縱下，或減縮為考訂、文字、校勘、訓詁的學科總名，或被哲學、文學、史學等新式分類掏空成西方「中國學」的同義詞，或根本被拒於現代學術分科的體系之外（見第八章）。對於這個意義非凡的大轉折，本書所昭示的一項饒富弔詭意味的基本洞察是：不論其對傳統文化的評價立場偏重的是守成（如《國粹學報》與《學衡》諸君），或是批判（如胡適、傅斯年、毛子水的等新文化人士），當兩代學人急於催促中國及其學術走向世界，有意無意卻都導致國學的邊緣化，而國學的邊緣化則成就了史學的中心化。

這項洞察所體現的多重觀照角度以及對歷史弔詭的敏銳覺知，可謂本書靈魂

剛、何炳松等「自由派」（liberal?）學者的史學思想，議題上則偏重民族主義對史學思想的形塑關係。

之所以在，使本書在讀來令人時感吃力的「牽纏反復」的敘述背後，透顯著引人思之再三的歷史洞見甚至憂患。事實上，本書對於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的探討，最大的貢獻也就在於：既闡明了國學融入（銷融於）現代學術分科體系的思想進程，也揭示了此進程所預設的國學的祛魅化歷程。這樣的雙焦點觀照使得本書脫離慣見的「現代化敘述」，逼近當代反思現代性的關懷。作者這種多焦點分析力道的另一展現，亦即是本書的另一項貢獻，在於對清末國粹學派人士之兩難的論析（見一、二章）。作者對其科學信念之重視，乃為前人論著所未逮。他的分析讓我們清楚看到：國粹學派人士雖高舉「國粹」的旗幟力辯國學之有用，然其科學信念所促成的以科學重新定義「學」的知識論取向以及「崇實戒虛」的「物質化」價值取向，長遠看來，反使他們更像是國學祛魅化的始作俑者。

科學信念的勃興以及國學的祛魅化，雖是由兩代學人的民族主義動機與「尊西趨新」心態所促成，卻也在其內心孳生文化認同的問題，特別是對反傳統人士而言。在這個脈絡下，作者有關毛子水等新文化人的「世界」意識之歷史功能的闡述，尤其值得注意並予以進一步辨析。作者指出，透過「世界」的空間概念，新文化人「賦予傳統與現代的時間區分以新的含義：世界常常代表『新』的未來，而中國更多象徵著『舊』的過去」（頁259）。如此一來，一則人們只要在「當下」（空間）「此刻」（時間）致力於斬斷傳統的聯繫，便有使中國（及其學術）以平等地位躋身世界的前景可言；二則超越中西、古今二元對立的世界概念，可使人們「通過時空移位而不時轉換身份認同」，從而能使其「可以激烈反傳統且公然認同於西方而沒有多少內心不安」。據此作者認為，「近年說得熱鬧的人我之別（Other &/vs Self）理論對新文化人的詮釋能力便相對有限」，因為「時間上的『現在』」使新文化人士「輕易超越空間上的中西對立，而空間上的『世界』又使他們隨時可跳出（中國）『古代』的籠罩」（頁260）。言下之意是：世界意識是對「人我之別」的化解與超克。

作者從身份認同的角度切入世界意識的問題，確有見地。另一方面，我們雖無從得知上面作者所說的理論究竟為何，然若從後殖民主義理論的觀點來看，世界意識的問題顯然繁複許多。所謂「時空換位」、「轉換身份認同」的現象，其實可輕易理解為一種將「他者的」（歐美）觀念與價值內化成「我的」的自我殖民過程。這樣的理據為我們開啟的歷史面向是：殖民主義往往仰賴與普遍主義（universalism）形成一種共生關係（亦即將「特殊的」視為「普遍的」）而遂行，而近現代西方殖民主義在非西方國度的知識論條件（epistemological condition）之創

生，則正透過諸多西方概念（如科學、學術概念）的普世化而啓動。事實上，作者引述一九二三年錢玄同說：「中國現在的新文化，就是『現代的世界文化』」（頁305），恰好精準地反映了這種殖民論述中「新」、「世界」與「西方」之間的代換關係²。總之，若從上述的觀點來理解本書所指陳的世界意識（以及「尊西趨新」心態），則我們當不難看出，傾向於以「西方」界定「世界」（意謂：新的、普遍的）的世界意識早已見於清末國粹派人士，並且其歷史功能亦不止於化解認同危機，還在於啓動知識論上的變革；後者這項變革正是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的一大前提條件，尤其不可等閒視之。

儘管庚子後詭譎多變的思潮使得國學的命途出現大轉折，然期間學人們的思想及關懷亦有一以貫之的面向。這種斷中有續、續中有斷的情形，可謂新舊交替之際的常態，而本書題名「國家與學術」正為我們點出一個顯例。〈自序〉中作者提到，貫穿本書所論之思想論爭「最顯著的主線是（廣義的）學術與國家的關係」（〈自序〉，頁4），亦即是兩代學人對於學術是否能，以及如何能有助於中國「走向世界」的普遍關懷。作者這個有關「延續性」的論點毋寧是中肯的，然正如上面他在「學術」之前以括號置入「廣義的」修飾語所暗示的，此延續之中實猶有意義非凡的斷裂，值得予以深入辨析。

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一個關鍵性轉變：清末以降，當人們開始以科學重新定義「學術」，其後果並不只是上述國學之漸失「粹」的價值光環，而且是「文化」與「學術」概念的日益區隔，以及此區隔所開啟的「價值」與「事實」的分離。更具體地說，清末人士襲自傳統的學術概念乃涵括文化的廣義學術，而二十年代學人普遍認知的學術則是與文化區隔的現代的狹義學術。至於價值與事實的分離，則直接反映在二十年代學人所持「學術獨立」的觀念³。事實上，作者也注意到學術與文化概念的區隔及其長遠的意義，例如本書結尾他寫道：「正是『國學』的淡出進一步確立了『中國文化』這一稱謂的主流地位，此後『學術』的含義日

² 晚近杜贊奇（Prasenjit Duara）教授在這方面已多所論及，可參見 Prasenjit Duara, *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: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* (Lanham; Oxford: Rowman & Littlefield Publishers, 2003), pp. 9-40, 89-129。

³ 一九二五年，在回應陳獨秀譏諷其所提倡之整理國故是「要在糞穢裏尋找香水」，胡適的辯解即明白反映這個分離。他說：「我們整理國故，只是要還他一個本來面目，只是直敘事實而已」，糞土與香水「皆是事實，皆在被整理之列」，「如斯而已，更不想求得什麼國粹來夸炫於世界」（轉引羅志田：《國學與學術：清末民初關於「國學」的思想論爭》，頁342-343）。

漸收縮，昔人思考的『學術與國家』的關係到今天已變為『文化與國家』的關係了。」（頁403）揆諸作者這項觀察，以及全書對「從國粹到國故」之轉變的著力鋪陳，民國學人在「國家與學術之關係」這一問題上所展現的裂變，作者實有必要給予更多的注目，畢竟此乃民國學術史上一大發展⁴。其次，正如上述作者有關延續性之論點所彰顯的，學術與文化之分離所催生的「學術獨立」觀念其實並不穩固，因此對此觀念所意涵的「價值」與「事實」之分離，我們有必要進一步辨析其性質。依筆者之見，質言之，這乃是一種態度層面上對價值與事實的區隔，迥異於休姆式的(Humean)在知識論層面上認知到兩者的邏輯斷裂：邏輯上兩者間有一無法跨越的鴻溝，因此「實然」命題無法推論出「應然」命題。不管筆者此見是否正確，重點是：唯有完成這一層面的分析，則往下延伸本書的歷史視野至三十年代（及此後近半世紀），我們才能有力地解釋一個重大的新發展：馬克思史學興起後所見之政、學的再度合流⁵。

嚴格講，本書並不好讀。依筆者淺見，問題之一在於作者較吝於為各章的討論，自覺地析理出主要的論證(arguments)並做簡要陳述，致使各章分析觀點顯得不夠明確，讀者恐要反覆閱讀推敲，方能領會章節間綿密的敘述背後的旨歸。問題之二在於原始文獻的直接引述過繁過長，有礙行文的流暢與思路的清晰，可讀性因而大打折扣。總之，本書無論就主題或篇幅而言皆屬宏構，作者若能對上述問題稍加費心，讀者登堂入室想必會更優遊自在。

⁴ 王汎森即曾從「價值與事實的分離」切入二十年代的史學發展，足供參考。見王汎森：〈價值與事實的分離？——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〉，《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2003年），頁377-462。

⁵ 當然，單單考慮「學術獨立」觀念之性質並不足以充分解釋這個現象，我們至少還須考慮：人們是否有「政治獨立」——政治作為一自主的領域，有其獨立的運作邏輯——的觀念？